

领导阅示：

内部资料

郑州轻工业大学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决策参考

〔2019〕第9期

（总第9期）

2019年9月30日

大学生就学流动的影响因素及策略

本期导读：

教育是获得社会地位和实现社会流动的关键机制。通过对大学生及其家长的访谈，分析了跨省就学流动发生的微观机制，讨论了影响学生高等教育就学地选择的微观和宏观因素。研究发现，性别和家庭背景对就学地的选择有重要作用。在个体性的微观因素之外，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情况、高等教育招生体制等制度性因素限制了学生的选择空间。在宏观制度的框架下，学生和家长基于高考分数发展出了一套“不吃亏”的选择逻辑，以最大程度上保证高等教育的象征性价值。学生高等教育地域的选择，可能是其主动选择的结果，也可能是对其他因素权衡下的伴随结果。

大学生就学流动的影响因素及策略

孙亚梅

教育是获得社会地位和实现社会流动的关键机制。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既体现在个体在社会结构上的阶层流动，也体现在地理区域上的空间流动。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机会进入大学，同时，也有更多的大学毕业生们离开高校进入劳动力市场。在高等教育前端和后端发生的两个阶段的空间流动，承载着个体由学生向成年人的变化过程，是青年人社会化的重要方面。从宏观角度来看，大学生用脚投票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当前经济社会不平等发展的现状。作为未来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具备高素质、高技能的新生劳动力，他们就学地和就业地的选择也昭示着中国区域和城市发展的趋势。目前，我国关于大学生地域选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后端，即已经完成教育过程的毕业生的就业流动上，也就是就业地的选择上。高等教育扩招之后，大学生的就业选择问题，始终是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问题。有不少针对大学生毕业后就业流向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如大学生就业的行业部门，岗位特征、地域分区等，也有针对不同大学毕业生群体做出的专门讨论，如女性毕业生、少数民族毕业生、创业大学生群体、选择到基层就业的群体等。涉及就业地域流动，总体来看，“孔雀东南飞”现象较为常见，凸显了大中城市相对强势的市场作用对劳动力的吸引力。相比之下，关于大学生就学地选择的专项研究就较为匮乏了。现有涉及就学地选择的研究

中，往往将其作为就业流动的一个影响因素纳入分析，说明前期的就学流动影响到后期的就业流动。有研究基于招生执行计划数据，证明高等教育迁移规模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扩展而扩大，也与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在区域间的不平等分布紧密相关。我国的高等教育招生政策规定，高校必须制定面向各省的招生计划，所以流动的规模和方向是已知的，不受学生个人或家庭的影响。从高校在各地的分布来看，北京、上海等地必然吸引其他省学生的流入。但是，仍有一些未知且重要的问题少有解答：在各省招生规模范围内，哪些学生选择流动，哪些学生选择留在本地？学生是如何做出在本地还是在外地上大学的选择的？他们去或者留的决定，背后暗含了哪些理性化的目的？解答关于就学地选择的问题，将个体的决策纳入政策和地区资源不平衡分布的宏观环境之下加以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当前就学流动的原因和未来趋势，这无论对于理解处于人生阶段过渡期的当代青年，还是对于筹划一个地区未来发展所需的人才储备，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微观到宏观

就学地选择的影响因素 高考之后在哪上大学的问题，是基于学生高考成绩和个人兴趣做出的选择，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决定是完全由随机的个体性所决定的。对于尚未踏出校园的准大学生来说，父母搜集信息的能力和判断力无疑是他们去哪上大学的重要影响因素。从更高层面上来看，学生及家长的选择也受到宏观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影响。从微观的家庭因素，到宏观的制度环境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影响着大学生在哪上大学的决策。

1. **阶层与性别**：父母的支持和期望 家庭的阶层差异对大学生高等教育选择的影响，已在既有研究中得到了证明。国外的研究也表明，中产阶级家庭在支持孩子离开家上大学这一选择上的积极影响。本研究的资料支持这样的结论，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在教育过程中，城镇家庭的子女比农村家庭的子女能从家庭中获得更多的建议。父母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能够转化成子女就学选择的优势，通过提供更多的信息增加子女选择的空间。我们能通过以下对比看出差异。

“因为我们老家是农村的，其实没有太多的人的意见可以参考。像农村，他们也没有太多的经验，文化程度也不高，所以他们能给你的只可能是生活上，还有物质上的支持……学业这方面他们帮不了你太多，主要还是你自己做决定。自己也不懂，随便一选这样了。”（男大学生，来自农村，在省内上学）

“孩子到了这个高三年龄段了，家长也都互相探讨，一般比较留意这方面的信息。他爸爸经在省内上学）

“孩子到了这个高三年龄段了，家长也都互相探讨，一般比较留意这方面的信息。他爸爸经常看这个东西，拿着那个大本看。他（指孩子父亲）当时上学的时候就学的这个专业，他学的就是这。”（母亲，来自城市，儿子在省外上学）

家庭的影响不仅在父母获取信息的能力的差异上，还在于家长对于女儿和儿子未来发展的不同期待，这是差异化的社会性别期待在家庭层面的反映。虽然，当前社会上对于女性主义的支持声音越来越大，但在实际的家庭中，家长还是受到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认为男生应该出去闯荡，而“安稳”是女生理想的生活状态。对于一些家长来说，是女儿，就是选择在本地上学最充分

的理由。“有很多学校可以选，但是我的（孩子）因为是个女儿，我考虑就是不想让她离家很远，原来也可以上 Z 大，也可以上河大，还有外边很多学校，但是我考虑女孩，我就根据家里实际情况，我就让她选择到 H 大学，离家比较近。”（父亲，女儿在省内上学）“我还是觉得在外地（上学）好。俺毕竟是个男孩，还是需要摔打摔打。”

（母亲，儿子在省外上学）。虽然家长在子女选择就学地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绝对的。更准确地说他们是发挥着信息节点的作用，通过将自身的社会资本转化为与教育决策相关的信息，供子女参考。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思想观念也随之变革，尊重孩子的意见成为中国父母普遍接受的一种想法。不少父母在发表对孩子未来发展方向的意见时，都强调要尊重孩子自己的兴趣。但是，撇开理性的思虑，父母还是希望孩子能够在自己身边。“这种事情不是父母能左右的。你想叫她省外，她不见得省外，你想叫她省内，她不见得省内，还得看她吧，看她的意愿。但是家长还是肯定想叫她在自己的身边哪，我跟她妈的意思，那最好是在省内，在咱这。”（父亲，女儿在省内上学）对于成长在迅速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青年来说，趁着上大学的机会走出家乡是他们更向往的选择。“不想在本地上学，因为在 KF 市都待了 6 年，就不想再待了，就想，只要不是省内，其他都可以的。”（女大学生，省外上学）“他们（指父母）曾经说过，让我留省内，读个师范什么的，我就觉得他们那个思想，跟我简直没办法沟通。所以我就基本没有听他们的，就觉得我自己的路自己决定就好了。”（女大学生，省外上学）美国学者英

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提出，现代社会的重要表征就是具有一系列心理特征、价值观念、行为倾向的现代人的出现。在现代人的 14 条特质中，第一条就是“准备接受和乐于接受他未 经历过的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对于正在经历现代化变革的中国社会来说，青年人普遍持有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态度就是一个例证。这样的心态和行为倾向，同样表现在青年学生的就学地选择偏好中。

2. 经济与文化：“离乡”去追求“理想” 在当今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仍然是基本国情。在中西部某些地区仍然挣扎在摆脱贫困的困境中时，北上广深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已经以国际化的发展水平活跃于世界舞台。对于成长在相对落后地区的学生来说，去外地上大学不光是接受高等教育，更是他们见识更大社会的机会。地区发展差异引致的就学流动，契合了解释人口流动趋势的经典推拉理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地区的推力和发达地区的拉力，给了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学生更多离开家乡省份上大学的理由。学生和家长都通过大学期间参与社会实践项目的差异给出了他们选择大都市的理由：

“上海这边的话，学校外面有一些活动。我参加的志愿活动和家里完全不是一个层次，我在那边参加的活动都是国际性的活动，像劳伦斯世界颁奖典礼、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当时我和明星他们都是近距离接触，这些活动层次和服务质量是不一样的。”（男大学生，外省上学）

“在上海那肯定不一样，那接人待物啊、消费观念啊、视野啊她都会不一样。你看她当志愿者，上这个叫啥啊，上海新开这个迪士尼，她

是志愿者。她还去上海站搞售票啥的，都是志愿者。还有电视台，搞节目，他们（活动）都不断。”（父亲，女儿在外省上大学）对就学地的选择，还暗含着学生和家长对高等教育阶段的社会化期望。大学是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人进入社会之前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个时期掌握的技能直接关系到毕业之后的就业能力，而这些能力的获得不再局限于校园内和书本中，也超出了学校本身所能承载的教育功能。家长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出在大学阶段要在“接触社会、待人接物”和“为人处事、适应环境”上有所增益。而在远离家乡的大城市中，“这个学习范围，包括这种社会经历和人的沟通上，保证要比这种小城市要好一点，然后你接触的多，到你将来工作中绝对是一个优势。”

（父亲，女儿在外地上大学）接触社会的需求是选择在外地，尤其是大城市求学的理由。这种综合能力的获取还要依托于城市和发展环境。在远离家乡的大城市中，发达经济支撑下的多元文化和实践活动给了学生在家乡难以获得的历练，也成为他们就学流动的一个动机和期望。

3. 高考和高校：招考制度造就的天然优劣势 我国高等教育采取分省考试招生制度。各个高校在录取工作开始之前，就已经制定了在各个省份的招生名额计划。分省招生制度通过高等教育名额分配照顾到了基础教育落后地区，但对于人口大省来说，有限的名额却造成了另一种不均衡。另一方面，高校在属地招收更多学生已经成为常态。2008年以来教育部出台的政策有效减少了央属高校属地招生的比例，但由于招生计划的内在规律和历史惯性，平衡各地入学机会差距的政

策目标仍是难以奏效的。当人口众多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匮乏的状况叠加在一起，就注定了该地区的学生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的劣势，这就是本研究所访谈的生源地 H 省的现状。考生数量的庞大和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匮乏，使得 H 省成为社会公认的高考最难省份之一。高考中亲身体验的激烈竞争使得一部分学生急于逃脱这种环境，甚至影响到了他们未来的人生规划：“觉得在省内我就是出来，我就是个傻子，就是个高考的工具。但是别人同样也是高考，别人同样还是学到了 很多蛮有用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以后不要回去了，不要让自己的孩子再遭受这种痛苦。”（女大学生，外省上学）“既然考了一本，那就去外地上吧，选择更广一点，毕竟咱们这的一本学校很少很少。特别整个教育系统都不太好，我觉得，反正上这么多年，是不想在 H 上了。”（女大学生，外省上学）有限的重点大学数量和专业设置，意味着成绩优异的 H 籍考生如果要上国内顶尖院校，选择必然是离开家乡。为了补偿学生在高考竞争中的劣势，H 省的重点高校一直把招生名额大规模投放在省内。例如，在 H 大学的 2017 年的招生计划中，共计划招收本科生 9890 人，而在 H 省投放的名额为 7200 余人，占七成多。这也就意味着本地的高校能给学生提供更低的进入门槛，吸引更多的学生留在本地上学。这种因招考制度设置而同时存在的推力和拉力，是学生和家长在选择就学地时必须同时考虑的方面，也是我们要接下来分析的内容中要重点讨论的方面。

二、宏观与微观因素的交织：最大化高等教育符号价值的策略

从个人到家庭，再到宏观制度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学生高等

教育就学地的选择受到多层因素的影响。无论在哪个层面，似乎都有鼓励学生走出家乡接受全面教育的需要，也有支持学生在本地上大学的理由。面对这些时而相左的考虑因素，学生和家長在有限的选择空间里，发展出了一套策略，将最大化高等教育的符号价值作为主要考虑，也就是在高考成绩基础上，选择排名最为靠前、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声望的大学或专业就读。作为高等教育决策的一个方面，就学地的选择既有可能作为决策过程中考虑的主要方面，也有可能是作为其他选择的附属结果而产生。就学地的选择，是学生在多层因素制约下的自主性和有限性综合作用的结果。

1. “不吃亏”的策略

无论外部因素如何复杂，个体情况如何多样化，学生和家長在选择就学地时最直观的考虑因素就是高考成绩，这是他们确定范围、筛选高校的首要基准。几乎每个访谈对象在回答“如何确定去哪上大学”的问题时，首要提及的因素都是高考成绩。按照现实的情况，一个学生的高考分数越高，他选择的范围就越大，但在他们的逻辑中，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每一个分数，不论高低，都对应着一个有限的选择范围。他们在激烈竞争环境和有限信息限制下能做出的最好的决策，就是使最后的结果“不吃亏”。“俺反正是压线走的，一分也不吃亏，也不占便宜。不说不占便宜，一本分高的多着呢，她正好不吃亏。”（父亲，女儿在外地上大学）“你要按她当时的成绩，她考的分数高，但是上这个学校有

点儿亏。”（母亲，女儿在外地上大学）以上分别是两个家长在评价孩子报考志愿时作出的回答，前者压着分数线被录取，认为是最成功，后者超出了分数线，被认为是“有点儿亏”。不吃亏，是附着于高考分数之上的逻辑。对于学生而言，“多考一分，干掉千人”，在如此激烈的宣言激励下争取来的分数，是凝聚着学生时间和心力的价值物，自然要尽最大努力保证其价值的实现。而实现其价值的方式，就是通过填报一个好志愿，进入一个“不吃亏”的大学。凭借高考分数报考志愿的过程，就像在市场中的一次性交易，保证其等价交换，是家长和学生填报志愿、选择就学地时的行为逻辑。而就学地的选择，就是在“不吃亏”的逻辑支配下，通过“权衡”这样一种具体的决策过程而实现的。

“权衡”下的选择 想要让分数“不吃亏”地实现其价值，选择范围自然就缩小到有限的几个高校。再加上学生可能对某些学科产生的兴趣偏好，选择的空间就更加有限了。这时候，宏观制度因素开始发挥其影响力。由于普遍存在的属地招生优惠，当地高校在吸引学生上具有充分的优势，也就使得不少学生因此留在本地上学。“俺倒是从来没有说排斥她到外地上学，实际上，不上外地主要是因为她的分的原因，因为上不了一个好的学校。她那时候选择学校，一看，你去上别的还不如上这里，是不是？其他那些（高校），不管是从知名度啊，还是师资力量啊，还是专业设置，都不如这里，那何必偏要上外地？没必要。因为分不够，你没法了。不是还想叫她上个一本，因为她过一本线了，还想叫她

上个一本，所以说只有选这个。”（父亲，女儿在本地上学）学生填报和最终被录取的地点是集合了高考成绩、个人兴趣、家长期望、招生分数线、专业设置、省内外教育资源等在内的综合因素的结果。而考虑到本省的高校在面向本省时给出的较多招录名额，留在本地上学对学生和家长来说是更优选择。另外，学科专业也是学生和家长做选择时会重点考虑的方面。对学科专业的选择受限于高中时期所学的科目，也受到未来就业市场上可能面对的职业性别分工的影响。分数、性别、兴趣偏好这些个体性的微观因素，与就学资源、学科设置这类制度因素交织，共同决定了高等教育就学地的选择。在本地还是在外地上学，对于一部分学生来说是其有意识的选择，但对另一些学生而言，也有可能是一个嵌入到其他考虑因素当中的附属结果。“地域不是放在第一位的，它是在考虑范围之类但是不是主要因素。选择的主要是根据高校来选的，因为第一方面当时跟自己高考成绩有关，第二方面就是看自己的兴趣。”（女大学生，外省上学）也就是说，学生在分数可及的基础上根据个人兴趣和其他因素已经确定了某所高校，而在本地还是在外地，是相伴而生的结果，并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或不在选择过程中占重要地位。在本地还是在外地上大学，可能会被“上某个大学”和“学什么”而决定。这也给研究以新的启示，即不能以研究的逻辑代替生活的逻辑，不能想当然地假定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的主观性和目的性。在本研究中，也就意味着，学生是否发生就学流动，可能是其基于自身条件和兴趣进

行主观选择的结果，也可能是教育决策的其他方面影响下的伴随结果。而无论哪种情形，都必然受到宏观高等教育招考制度和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状况的影响。

三、结论

跟以往研究得出的结论相似，本研究认为家庭阶层、父母的社会和文化资本会影响子女的就学选择。同时，性别也会对就学地的选择产生作用，即受到社会性别期望的影响。在宏观层面上，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导致青年群体离开家乡省份去往发达地区就学的主要推动力。追求新环境和新体验这一表征当代青年人高度现代性的特点，也是驱动就学流动行为发生的因素。在制度层面上，高等教育的分省招生制度使得高等教育资源匮乏省份的学生处于不利地位，促使本地学校对本地学生补偿性地开放更多招生名额，增加了本地高校的吸引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选择就学地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基于自身能力（高考分数）的综合权衡。也就是说，在分数基础上选择尽可能排名靠前、名望较高的高校或专业，以达到高等教育象征价值最大化的目的。

作者简介：孙亚梅，博士，讲师，郑州轻工业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工作系，郑州轻工业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电话：150 1152 0966 **邮箱：**yameisun@foxmail.com

关键词：大学生 就学地 就学选择 高等教育

报 送：省委、省政府领导及相关部门 寄送 18 市市委、政府领导及相关部
门

中心地址：郑州市科学大道 136 号政法学院二楼 203 室

邮 编：450001

电 话：0371-86609698 电子邮箱：zzuli_shfzyjzx@163.com